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丁金

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评价

INDICATOR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QUALITY OF LIFE

周长城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 及其现状评价

INDICATOR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QUALITY OF LIFE

周长城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评价 / 周长城等著 . — 北京 :
经济科学出版社 , 2009. 9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ISBN 978 7 5058 486 4

I. 生… II. 周… III. 生活 质量 研究 中国
IV. F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2712 号

责任编辑: 解 丹
责任校对: 徐领弟 杨 海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邱 天

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评价

周长城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伊092 16 开 36.25 印张 690000 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 7 5058 486 4 定价: 87.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课题组主要成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Heinz-Herbert Noll [德]	毛宗福	吴淑凤
殷燕敏	周运清	张雷声
张 蕾		
陈 云	柯 燕	

编审委员会成员

主 任	孔和平	罗志荣			
委 员	郭兆旭	吕 萍	唐俊南	安 远	
	文远怀	张 虹	谢 锐	解 丹	

总 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双百”方针，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理论创新为主导，以方法创新为突破口，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立足创新、提高质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呈现空前繁荣的发展局面。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理论创新，服务党和国家的政策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自2003年始，教育部正式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计划。这是教育部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教育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重大攻关项目采取招投标的组织方式，按照“公平竞争，择优立项，严格管理，铸造精品”的要求进行，每年评审立项约40个项目，每个项目资助30万~80万元。项目研究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鼓励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区的联合研究，鼓励吸收国内外专家共同参加课题组研究工作。几年来，重大攻关项目以解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以提升为党和政府咨询决策服务能力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为战略目标，集合高校优秀研究团队和顶尖人才，团结协作，联合攻关，产出了一批标志性研究成果，壮大了科研人才队伍，有效提升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实力。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为此做出重要批示，指出重大攻关项目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影响广泛，成效显著；要总结经验，再接再厉，紧密服务国家需求，更好地优化资源，突出重点，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这个重要批示，既充分肯定了重大攻关项目取得的优异成绩，又对重大攻关项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和殷切希望。

作为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秉持以管理创新

服务学术创新的理念，坚持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切实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对重大攻关项目的选题遴选、评审立项、组织开题、中期检查到最终成果鉴定的全过程管理，逐渐探索并形成一套成熟的、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管理办法，努力将重大攻关项目打造成学术精品工程。我们将项目最终成果汇编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文库”统一组织出版。经济科学出版社倾全社之力，精心组织编辑力量，努力铸造出版精品。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欣然题词“经时济世 继往开来——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成果出版”；欧阳中石先生题写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书名，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切勉励和由衷期望。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魂，是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深化的不竭动力。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强音，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迫切要求。我们要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新实践，适应新要求，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振奋精神，开拓进取，以改革创新精神，大力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更大的力量。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生活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看，一方面，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物质生活逐渐丰裕。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生活也日益丰富多彩。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困惑和疑虑，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是否提高成为评价中国改革是否成功，社会发展战略和改革政策是否正确的最有力的标准。没有生活质量指标的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发展状况，人民生活质量没有得到改善的社会发展无疑是畸形的、不健全的发展。改革的成果和经验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未来社会发展战略一定要牢牢以提高生活质量为基准和最终目的，这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体现，也是深化改革的前提。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摆脱贫困落后，基本实现现代化。“摆脱贫困落后”的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代化”的主体是人的现代化，所以这一战略目标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是一致的。中国社会发展“三步走”战略步骤的显著特点是以生活质量标准来衡量社会发展阶段，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一战略既规划了每一步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目标，也都有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即“温饱”、“小康”和“比较富裕”。第

一步目标已基本提前实现，第二步目标中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任务已于 1995 年提前实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则有待于进一步努力。建立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可对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人民的生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也可根据现有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规划下一阶段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

从社会发展战略高度将提高生活质量作为 21 世纪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并用指标体系对社会发展的现实加以评价。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评估、监督、解释与说明、规划、比较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1) 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评估作用。科学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能全面地衡量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水平，并对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生态环境等整体的社会发展做出合理的评估。(2) 对中国改革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具有监督作用。从该指标体系各项具体指标中可以看出人们的需求满足程度，与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相对照，衡量社会发展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可以帮助国家和政府掌握人民的生活状况，及时地发现偏低的指标，相应地调整社会政策，以在预期时段内达到预期目标，从而发挥监督作用。同时，它还可以间接地对各项改革政策进行检验，避免它们脱离促进社会发展的正确轨道。(3) 科学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还可对社会发展进行解释和说明。长期以来，GDP 成为国际上衡量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但随着各种社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GDP 缺陷越来越明显，它掩盖了社会生活的许多真实方面。在它之后发展起来的生活质量指标则对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进行了比较全面合理的评价和诠释。生活质量指标体系通过对社会发展的比较全面的评估，能揭示出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以及社会问题，并解释原因。(4) 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可分为评价指标体系和规划指标体系，其中规划指标体系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规划作用。这一点对于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规划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而言，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为其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提供实证信息和理论分析。

2 生活质量包括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生活质量指社会提供国民

生活的充分程度，主观生活质量指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在客观方面，政府根据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实证资料可以了解人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收入、消费结构等，以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基准，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做好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在主观方面，通过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可以了解人们对生活状况的评价和满意度，如教育抱负，对家庭关系与婚姻关系的期望，对家庭财富的企盼以及精神财富的主观感受等，这些主观指标可提醒社会科学家和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警觉，如提醒政府尽力营造一个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维持社会的稳定局面。（5）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对社会发展还具有比较作用。

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这一概念最早出现时是作为生活水平的替代物而提出的。但是，随着财富边际效益日渐消失，经济增长的有限性及其对社会和生态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暴露，社会发展的纯经济视角的缺陷渐趋明显。生活水平研究对物质生活状况和经济条件的强调已无法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因此，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目标。生活质量作为一个多元维度的概念，不仅包括生活的物质财富方面，而且包括生活的非物质维度，诸如健康、社会关系或自然环境的质量等。此外，生活质量也是客观特征（实际生活状况）和主观幸福感（对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的统一体。

发达国家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始于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各国相继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极为关注，并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对如何提高生活质量和如何测量生活质量加以研究。国际学术界不断尝试用各种方法将生活质量概念操作化，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美国模式是其中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模式。前者是一种客观生活水平模式，强调客观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提高；后者则是一种主观生活感受模式，关注于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体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基本思路上的差异，是因为两者对生活质量、社会福利以及什么是理想社会的认识及实践存在本质区别。

以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为例，它将社会福利理解为满足客观需求。简言之，社会福利就是“个人拥有对资源的支配权，能够控制资源并且有意识地将其直接用于提高生活水平”。这些资源包括收入、财产、

教育、知识、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等等。显而易见，客观生活条件水平指标无疑是这一社会福利模式的最佳衡量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否认人们的主观感受。但主观评价的基础仍然是客观水平，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倾向于不将主观评价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最佳依据，社会政策只是社会福利测量的基本功能。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测量维度一般包括教育水平、健康保健、就业状况、工作条件、经济状况、住房条件、交通与通讯、娱乐活动、社会关系、政治参与以及社会流动。

相反，美国模式根据个人所体验到的需求满意程度来定义社会福利，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生活质量的客观方面，而是用满意度、幸福感来测量的个人主观感受。不同的研究对主观感受的认识各不相同，但均将幸福作为核心概念加以阐释。其中，既有将幸福分为满意度、积极的感受和避免挫折，也有将幸福分为生活满意程度、愉快的体验和不愉快的体验。当然，生活满意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认知判断，因为情感体验本身既包括情绪因素也包括感情因素。美国式的生活质量研究在传统上认为主观感受既包括情感的积极方面，也包括情感的消极方面；既包括情感维度，也包括认知维度。但也有学者虽将幸福定义为生活质量基本形式，却认为幸福既是一种认知概念，也是一种情感概念。幸福是“个人因其喜好所做的对于自身全部生活质量的个人评价程度”，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于生活的情感体验，即“情感享受”和对生活的认知评价，即“满意水平”，是生活质量中的两类不同变量。

中国生活质量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对生活质量指标进行了研究。综观国内相关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都有不少合理、积极的成果，这些研究为后来者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模式：（1）社会政策层面的社会指标模式，即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政府组织的政策性研究是这类指标体系的代表。上海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天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的大城市社会发展综合评级指标体系中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等都属于这一类。（2）个体层面的生活质量主客观研究模式。包括林南、王玲等人建构的分层式结构理论模式，卢淑华、韦鲁英建构的生活质量模式（1992），林南、卢汉龙

的因果结构模式（1989）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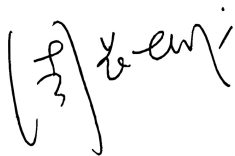
生活质量研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学者对生活质量的 research 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所进行的研究侧重生活质量的主观维度，尤其是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第二，这些研究大多以个人角度为主，较少涉及社会层面，没有突出政策含义；第三，现有的涉及客观维度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支撑；第四，缺乏从规划的角度，以社会提供的资源和公民从社会资源中受益两方面来测量人民生活质量。

本书（课题项目批准号：03JZD0012）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对现有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总结与借鉴。密切关注国际学术界或国际组织关于生活质量研究的动向，并全面考察国际生活质量指标的构建中有关权重的设置和综合指标构建的方法。全面考察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成就与不足。

（2）在原有构建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生活质量研究的最新动态以及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重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这一指标系统以客观生活质量指标为主，并依据此指标系统对当前社会的总体形势和具体的生活领域进行评价。^①

（3）在重构的客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设计并考察相应的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运用这些指标体系对城市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状况进行评估。评价分为总体评价和不同领域的评价，以此反映人们对现有客观状态的主观感受，并折射出不同生活领域的影响差异，为确立客观生活领域的权重提供依据。



^① 参见周长城等著《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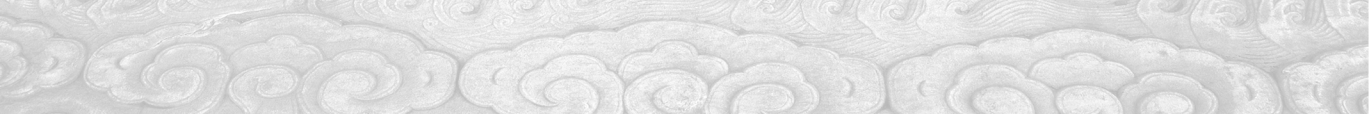
生活质量研究的动力来源于人们探求如何最大程度地满足自身物质、精神等需求的欲望；生活质量研究的目的在于如何在有限的社会资源制约之下最大限度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生活质量研究的展开，是人们思考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之间关系的结果；生活质量研究的结果是准确定位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人的生活状况。关注有关生活质量的评价体现了人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重视。

国际生活质量研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研究方法已日渐成熟，研究范畴趋于确定，研究领域更加宽泛。目前生活质量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个体层面的研究与群体层面的研究；测量方式也可明显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群体层面的研究从大量的跨地区、跨国家的生活质量调查开始向国家、城市、社区缩小，测量区域微观化是发展趋势。调查方法虽仍然以定量研究为主，但是在调查中已经开始关注文化、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等“非标准指标”的影响。个体层面对生活质量的测量是围绕着主观幸福感展开的。从 20 世纪 60 年代对特殊人群的主观幸福感的单纯描述到 90 年代通过研究结果揭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影响因素，构造如人格理论、适应理论、动态平衡理论、目标理论、流程理论、社会比较理论、评价理论等理论模型以至于目前利用一些严格设计和追踪研究的大规模跨文化调查来进行主观幸福感研究，测量方法的创新推进了研究理论的深入，促成了研究结果的生成。主观测量方法的特点是研究细致，针对性强，适合个体层面的研究，但是不能避免其测量过程中主观感受的隐蔽性和多变性以及研究结构可比性差，政策指导作用弱的缺陷；客观测量

方法虽然容易形成统一标准甚至国际惯例，适宜进行群体层面研究，所得结果可比性强，但是往往由于在实际测量中不能够兼顾到文化、风俗、历史传统、生活习俗、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差异的作用，所得结果也常常因为缺乏实际反应力而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中国生活质量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一直以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为研究主体，研究内容上以个人主观维度生活质量指标研究为主，较少从规划角度涉及社会整体层面。这样的研究现状不利于帮助政府从宏观层面把握居民整体生活状况，制定有针对性和执行力的措施提高居民整体生活质量，难以将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和基本要求深入贯彻。本书旨在把握现有国际国内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的基础上，以社会资源供给与需求为重构客观生活质量评价的主要工具，重构客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并考察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对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总体状况和不同领域的状况进行评估。

本书分编编纂。第一编对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进行全面介绍，从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分析各种指标体系所具有的特点、要素，并揭示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指标体系对构建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启示与借鉴。第二编以客观指标的构建与评价为主，从物质福利、消费、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社会公正、公共安全、环境、休闲和住房等方面对当前中国居民的客观生活质量进行考察，以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成就。第三编将在系统介绍部分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理论和实证层面的探讨，寻找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客观维度与主观维度的结合途径，并尝试构建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总体研究上力求以适当的主观测量辅助客观测量，实现客观与主观、定性与定量的有效融合，力图构建主客观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



Abstract

The impetus of the study on quality of life roots in the pursuit of human on how to satisfy the appetency for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to the maximum;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on quality of life rests with how to seek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to the utmost extent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limited social resour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udy on quality of life is the result of human's meditat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result of study on quality of life lies in positioning accurately the life condition of human of different ages or fields. The attention to evaluation of quality of life reflects the recognition of human of their own living conditions.

With nearly half century of development , the study on international life quality has attained remarkable progress. Study methods have gradually taken shape , the scopes of study have become definite , and the fields of study have been widened to a larger extent. Currently the study on quality of life has two major orientations , i. e. the stud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the study at the colony level;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stinct categories , i. e. the qualitative study and the quantitative study. The study at colony level starts from enormous cross-regional and cross-national investigations into quality of life to investigations in narrower scopes such as countries ,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indicating the microcosmic tendency of measurement scope. As far as measurement approaches are concerned , though quantitative study is used as the primary method , “non-standard” indicators such as culture , religious belief , social custom have gained their weight in the investigations. The stud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s carried out by centering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From the simple descrip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pecial group in the 1960s to the reveal of effect mechanism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s such as the Personality Theory ,

Adaptation Theory , Dynamic Balance Theory , Objective Theory , Process Theory ,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and Evaluation Theory in the 1990s then to the stud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the rigorously designed and tracing massive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time being , the innovation of measurement approaches has prompted the deepening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facilitated the produc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Subjective measurement approaches are featured by preciseness of research , high pertinence which is considered appropriate for study at individual level. However , some features of subjective measurement such as the concealment and changefulness of subjective feelings in the process of measurement , the deficiency of comparability of research structure and the weaker role of policy guidance are unavoidable. Objective measurement approaches favor the formation of uniform standards and even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s well as strong comparability of results produced , which is considered suitable for colony-level research. However , because the objective approaches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effects of differences at levels of culture , custom , historical tradition , life habitude , social custom , religious belief etc , it is not unusual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fail to live up to expectation due to shortage of actual reactivity.

Sociologists and social psychologists have been the subjects of China's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fe since the 1980s. The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indicators which reflect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al quality of life of individuals , which pays less attention to the holistic feature of society from a long-term planning angle. Such situation impedes to some extent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in getting a holistic view of living conditions of residents and working out targeted measures to improve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 thus makes it difficult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people-oriented" methodology in a thorough and conscientious manner. The book aims to , on the basis of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hand-on research results of life quality indicator system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 reconstruct the objective life quality indicator system and review the subjective life quality indicator system by taking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social resources as a chief instrument to serve that purpose. Based on that , the book intends to conduct evaluation of ,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life quality of the China's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situation of life quality of different fields by using a life quality indicator system which combine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ones.

This book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Part I gives a general review of life quality indicator systems at 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levels , conducts analyses of characteristics and elements of various indicator systems both at individual level and at colony